

向市场过渡中的私营企业^{*}

李 路 路

内容提要:在私营企业存在的相对市场化的环境中,什么因素在企业成功中具有重要作用?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本文通过有关的实证资料作出统计分析模型,验证相关假设,其主要发现为:就私营企业的成功而言,“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产”并存;教育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网具有相对性;需求和交易成本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所具有的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型转型和经济体制上的混合性特点,导致社会结构变革的机制及机会结构的混合性,从而决定了私营企业的成功为多种机制推动的结果。

在私营企业存在的相对市场化的环境中,什么因素在企业成功中具有重要作用,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将有可能更多地显现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状况、社会分层机制或社会不平等变化的程度和趋势。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复杂和多元的过程,通过对私营企业“成功”的分析,我们可对这种特定转型过程的性质、机制和未来前景形成基本判断。而上述状况与社会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有紧密联系。因此,对私营企业成功的分析实际上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社会因素或机制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什么会起这种作用?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一、基本分析变量和分析假设

本文的重点不是解释所有导致私营企业成功的因素。因此,对于下面将要涉及到的众多的有可能影响私营企业成功的因素,在本文中给出的关于私营企业成功的各个模型中,不可能进行详细的讨论和解释。本文的分析重点是想检验:传统再分配经济的因素,在一个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对于活动在一个较为市场化环境中的私营企业主来说,是否还具有重要影响,由此折射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征和趋势。

鉴此,在多种多样影响私营企业成功的因素中,我们最关心的不是那些一般的因素,而是有可能反映这一转型过程趋势的那些因素,它们主要是:第一,业主的人口统计学指标,主要是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第二,业主过去的社会地位特征;第三,业主的社会网;第四,企业的经营环境,例如企业所在地区(城乡和城市规模),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交通情况,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等。依此,对私营企业“成功”分析所涉及的指标分述如下。

(一)因变量

^{*} 笔者在一些论文中,曾经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各种可能因素的分别分析,本文是在若干模型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综合性分析。

私营企业的“成功”可用多种指标进行衡量,例如效率、规模等。考虑到中国私营企业发展实际水平和调查数据的信度,我们将被调查企业的总产值或营业额作为衡量企业成功的指标。总产值或营业额属于规模指标,它不像利润那样直接涉及企业的经营秘密,而且相对简单,便于统计。

(二)自变量

1. 人口统计学指标

(1)年龄

我们在其他讨论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的论文中,已经讨论过私营企业主年龄的意义(李路路,1998)。对于私营企业的成功来说,年龄的意义在于,那些相对年龄较轻的业主,由于较少接受传统再分配经济的影响,更能适应新的混合经济环境,因而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特别是那些曾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混乱年代并在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正常的社会经历受到破坏,他们不仅更倾向于进入私营经济部门,而且有更强大的动力希望通过私营的成功以改变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即:由于他们有更强大的向上流动的欲望,因此,在私营经济领域中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2)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具有不同意义。

在中国传统的再分配经济体制下,教育水平曾经长期对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没有重要作用。人们获得资源和占据一定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身份(单位,所有制,行政级别,城乡区域等),不存在劳动收益以及资源占有的市场调节(路风,1989;李路路、王奋宇,1992)。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和个人收益的作用早已得到了详尽地研究(Th. W. Schultz, 1975)。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不仅赋予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合法权力,而且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同的是,市场能为企业家和其它进入市场的人提供更多的刺激,特别是在对人力资本的高报酬上(Victor Nee, 1989, 1991)。撒列尼(Ivan Szelenyi, 1988)在研究匈牙利农村家庭农场和维克托·倪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时,都曾特别强调:当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教育水平对人们实现社会地位转变具有促进意义。当资源分配逐渐摆脱行政权力的控制时,与直接生产者或企业家相关的人力资本特征将会得到更高的报偿。在一个行政化的命令经济体制下,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具有强烈的行政取向,而市场体制的发展,将会越来越有利于直接从事生产和生产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市场规律的作用,将会鼓励那些经营效益好的企业,惩罚效益不好的企业;人力资本的价值和报酬在市场经济中将较为充分的表现出来。因此,在相对市场化的环境中,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私营企业主,将可能会比其它人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收集和利用信息,对改革中经常出现的政策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更为敏感,因而更有可能获得成功(Szelenyi, 1988; Victor Nee, 1989, 1991)。

中国的体制改革尽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体制的性质,但是,市场经济的成分已经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社会基层和私营经济领域中,市场机制已在许多方面占据重要地位,这不能不引起经济资源分配机制和社会地位获得机制的极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使得基于交易双方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市场交换关系逐渐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要素开始逐渐发挥作用,在过去只有国家行政权力决定资源和社会地位分配的地方,现在个人也有了主动权力。人们的教育水

平或受教育程度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

(3) 性别

在中国传统的再分配经济中,性别差别一般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差别。在理想主义政策和严格的再分配体制下,中国,至少在城镇地区,男女之间的各种差别,特别是在职业和收入上的差别,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性别因素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妇女同男子一样,从过去严格的再分配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第二,她们同其他人一样是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获得的这种自由,市场化的环境虽然使得她们摆脱了再分配权力的直接控制,但同时这种自由也受到市场化环境的制约,如果社会中对妇女存在着性别偏见的话,这种偏见将会对妇女的自由形成制约。妇女的传统角色和社会偏见,有可能迫使妇女更多地呆在家里从事家务或辅助性的工作,很难像男性那样创办自己的私营企业,相对于男性来说,更难取得成功,这种状况的变化,又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混合体制”的复杂情况。

2. 前社会地位(体制资本)

我们曾经在分析私营企业主的来源时,特别强调了他们在成为私营企业主之前的社会地位的意义,并且用“体制资本”的概念来描述传统再分配经济中各种制度化因素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鉴于这种体制资本的意义,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当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由于开始时市场经济不发达,以及属私人占有的经济资源极为匮乏,其它的资本形式将在社会中起相当作用,其中,“体制资本”将占有重要地位。

将上述有关体制资本的假设操作化,则体制资本主要是通过私营企业主本人的前社会地位和业主本人的政治面貌(是否是中共党员)等指标进行测量。

3. 社会网络关系

社会网络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它是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和认可为基础,带有排他性和平行性的特征,也可称为“社会资本”(伯迪尤,1997)。许多研究者对社会网络的特征和意义做了研究(Granovetter, 1973; Yanjie Bian and Soon Ang, 1996)。考虑社会网络关系在私营企业成功中的意义,不仅仅因为中国社会在传统上是一个重视人际网络的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制度转型,有可能使社会资本的意义更加重要(李路路,1995)。正在发育中的市场的不完备性,正式制度性安排的缺乏或转型时期的“制度真空”,社会网在一般意义上的资源与信息分配及交换的功能,以及新制度产生的“边缘性”(道格拉斯 C. 诺斯,1991)等因素的作用,都有可能使社会资本对私营企业的成功具有重要性。因此,我们倾向于假定,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网络关系或者说社会资本,对企业的成功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有可能转换为经济资本。由此,测定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网,主要是通过询问他们来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是谁来确定的,这些亲戚和朋友关系的分类和业主本人过去社会地位的分类相同。

4. 资金和人力

资金和人力对任何社会中的任何企业来说,都是影响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在我们的分析中,资金指标主要是指初始资金的数量,人力指标主要是指企业员工的总数。

5. 经营环境

经营环境会对企业的成功具有重要影响,这是普遍性的自变量。我们在研究分析中主要是考虑两类环境因素的作用,并将其主要作为控制性的变量:第一,需求;第二,交易成本。

需求和交易成本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发展空间

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我们的分析中,主要使用两个变量来测量所谓环境对企业成功的影响。

一是“行为”。一般来说,当私营企业开始发展时,那些被国家再分配经济忽视并具有较大需求的行为,将会对私营企业的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在国家集中几乎全部社会剩余的再分配体制中,政治目标经常优先于经济考虑而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目标是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实现工业高速增长,特别强调的是重工业部门的扩充。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将社会和人民的需求置于次要地位,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不平衡增长。为了实现这种目标,相应地对社会需求进行限制成为保持经济平稳的重要手段。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商品供求的尖锐矛盾,但在经济上造成巨大的结构性缺陷。一旦市场逐渐成为经济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的主导力量,满足社会 and 市场需求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导向。对于私营企业来说,行业空间不仅表现为传统经济结构中若干行业的低度发展或空白,因而较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了企业的成功;还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应该被认识到,即行业的低度发展或空白尽管在旧体制中已经存在,但它们是伴随着体制改革而显现出来的,在一些空白更多的行业中,私营企业不仅有可能较为容易地从市场上获得经营所需资源,而且其销售或服务对象也不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具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

二是企业的地理“位置”。我们将主要以城市规模、城乡差别和交通运输状况来描述这种地理位置有可能对企业成功产生的影响。由于传统再分配经济下资源配置的人为偏斜和中国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那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和交通运输状况较好的地区,会存在更多的需求,更低的交易成本,因而企业更容易获得成功。特别是对于农村地区的私营企业来说,普遍的交通运输状况的落后,将使得那些位于具有较好交通运输条件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利用或者开放社会经济需求,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的成功。在下面的分析模型中,交通运输状况是用省一级每平方公里可使用的交通运输里程为指标的。

上述一组因素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会成为影响企业成功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的分析中它们还具有特殊意义。

在传统再分配经济中,企业活动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其他通常对企业绩效具有影响的因素都丧失了作用。在一个相对市场化的环境中,如果私营企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进行活动,其他相关因素也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化的话,上述环境因素就应对私营企业的成功具有显著影响。因此,通过私营企业的成功,上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市场化发展程度,甚至向市场经济转型或过渡程度的指标。

在有关私营企业成功的分析中,将主要涉及上述变量,有时为了分析的需要,还会加进一些控制变量。

(三)主要自变量的基本分布(见表1)

二、私营企业成功的模型

各个自变量对企业成功的影响,在下面的不同模型中有所不同。我们使用了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方法来检验不同因素对企业成功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在下面的分析中,城市和乡镇的私营企业被区分开来分别进行分析,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城乡之间基本完全封闭,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严

表 1

主要自变量的分布

主要自变量	样本量(个)	1995年产值/营业额 平均值(元)	1994年产值/营业额 中位数(元)
业主过去社会地位:			
专业技术人员	78	5369114.03	1200000.00
城镇国有集体单位干部	566	8699605.44	2000000.00
农村干部	161	8131499.32	1600000.00
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330	9496227.93	1800000.00
农民	260	5267296.69	1000000.00
普通职工	470	6561959.43	1135000.00
个体户、专业户等	396	7773009.78	1450000.00
其他	99	6648912.92	1000000.00
教育水平:			
不识字	10	2822222.22	1500000.00
小学	241	4305290.41	800000.00
初中	1018	5358155.07	1200000.00
普通高中	820	7053460.71	1600000.00
职业高中、技校	6	3050000.00	1450000.00
中专	73	6140096.72	1200000.00
大专	184	10019562.00	2100000.00
大学本科	369	16670948.30	2800000.00
研究生	127	12214005.70	2240000.00
主要企业所在地:			
大城市	466	11063087.30	2000000.00
中等城市	465	9614983.04	1695250.00
小城市	742	5249212.59	1090000.00
乡镇	730	8444967.04	1580000.00
村	459	6280257.54	1400000.00
行业:			
农业	115	9898131.82	1900000.00
制造业	1130	9286120.04	2100000.00
交通运输业	67	5856164.52	1000000.00
建筑业	156	8161031.47	2000000.00
商业服务业	771	5555698.29	1000000.00
社会服务业	203	1889659.66	470000.00
其他	188	7950718.86	1200000.00
中共党员	483	9429428.23	2000000.00
企业成立时间:			
1985年12月前	725	9427838.72	1500000.00
1986年1月—1988年6月	398	9144293.44	2000000.00
1988年7月—1989年6月	224	9126658.53	2000000.00
1989年7月—1992年3月	498	8372134.80	1775000.00
1992年3月以后	954	5203866.31	1200000.00
性别:			
男	2565	8222975.96	1610000.00
女	296	4466080.95	600000.00

格的控制制度, 不仅将城市和农村分割开来, 而且基本上取消了两者的社会流动(李路路、王奋宇, 1992)。改革以来, 尽管城乡之间相互封闭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 但至今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没有根本变化。因此, 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经济发展, 城乡之间都表现出众多不同, 城市和乡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表 2

私营企业成功的分析模型 1

因变量: 被调查私营企业 1994 年底总产值或营业额

	农 村		城 市		备 注	
	b	t	b	t		
私营企业主人:						
中共党员	0.44 **	3.6	0.07	0.5	参考变量	
专业技术人员						
前城镇国有单位干部	0.21	0.5	0.42 #	1.8		
前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0.55	1.0	0.27	0.7		
前其他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0.23	-0.6	0.85 **	3.2		
前农村干部	0.35	0.9	0.92 **	2.7		
前农民	0.07	0.2	0.51 #	1.8		
前普通职工	0.13	0.3	0.23	1.0		
前个体户专业户等	0.32	0.2	0.43 #	1.7		
原城镇无职业者	0.09	0.2	-0.29	-0.9		
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亲戚:						
专业技术人员					参考变量	
城镇国有单位干部	0.21	0.4	-0.24	-0.8		
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0.39	0.7	0.28	0.8		
其他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0.52	0.9	0.82 *	2.3		
农村干部	0.30	0.5	0.33	0.7		
农民	0.26	0.5	-0.13	-0.4		
普通职工	0.08	0.2	0.01	0.0		
个体户专业户等	0.51	0.9	-0.21	-0.6		
城镇无职业者	0.29	0.5	-1.40 **	-2.6		
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朋友:						
专业技术人员					参考变量	
城镇国有单位干部	-0.34	-0.9	-0.16	-0.6		
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0.18	-1.9	-0.20	-0.6		
其他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0.10	0.3	-0.39	-1.3		
农村干部	-0.46	-0.9	-0.11	-0.2		
农民	-0.59	-1.3	-0.66	-1.4		
普通职工	-0.66	-1.5	0.41	-0.3		
个体户专业户等	-0.79 #	-1.9	-0.63 *	-2.0		
城镇无职业者	-0.33	-0.5	-0.07	-0.1		
年龄	-0.00	-0.6	-0.02 **	-3.6		
性别	0.47 *	2.1	0.54 **	4.0		
教育程度	0.18 **	4.5	0.14 **	5.1		
企业所在地:						
小城市					参考变量	
大城市			0.33 **	2.6		
中等城市			0.18	1.5		
村					参考变量	
镇	0.18 #	1.7				
人均国民收入	-0.11	-1.0	0.14 #	1.7		
交通里程/平方公里	4.35 **	6.0	1.04 *	2.3		
行业:						
社会服务业					参考变量	
农业	1.33 **	4.5	1.60 **	5.3		
制造业	1.24 **	5.6	1.12 **	6.7		
交通运输业	0.00		0.92 **	4.0		
建筑业	0.00		0.64 **	2.2		
金融业	0.00		0.90 **	5.4		
商业、服务业	0.00		0.77 **	3.3		
其他	0.90 **	3.3	1.08 **	4.4		
R2	0.15		0.19			
Cases	1039		1336			

#P < 0.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模型 1 是将我们在前面所列的几乎所有自变量, 都纳入到私营企业的成功分析中(见表 2)。

从模型 1 中, 可以看出三个明显的结果:

第一, 在农村地区, 中共党员身份对企业成功具有重要性, 但几乎所有其他与业主本人相关的体制性因素, 例如本人、亲戚和朋友的社会地位等, 都对企业成功没有显著性。

第二, 除了城市地区中业主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亲戚外, 所有亲戚和朋友关系, 即我们曾寄予很大期望的社会网, 都不具有显著性; 在另外一个模型中, 控制住初始资金的数量, 其结果与模型 1 基本相似, 各变量的作用没有大的变化, 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 特别是朋友关系, 没有显著性作用。

第三, 年龄、性别、教育等人力资本因素, 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都对企业成功具有重要性。

除此之外, 那些控制性因素, 例如交通状况、行业等, 也对企业的成功具有重要性。

我们将暂时不对模型 1 进行详细的讨论, 但是, 我们将对社会网在模型 1 中不具有显著性给予特别的关注, 因为这一结果不仅与前面的假设不相一致, 而且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果朋友关系在不同的模型中都不具有显著性的话, 是否可将这一因素排除, 然后看看私营企业的成功模型有什么变化。

模型 2 将私营企业主的朋友关系排除在分析模型外, 其他变量则保持不变, 然后看其他变量的作用是否发生变化(见表 3)。

将模型 2 与模型 1 比较:

——各变量的作用基本上没有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区, 至少我们可以说, 在上述方法对这次调查数据的分析中, 没有发现朋友关系对企业成功具有重要性, 然而这里必须强调的是, 人们不能简单地对待这个结果。

——中共党员身份在农村依然具有重要性, 而其他与个人相关的体制性因素和社会网因素, 在农村都没有重要性。

——在模型 2 中, 几乎所有在模型 1 中具有显著性的变量, 都依然保持着显著性, 而且相对于模型 1 来说, 其显著性水平还有所提高, 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几个变量的变化:

第一, 过去是城镇国有集体单位干部的业主, 成功的可能性增大; 而那些目前企业在城市、过去是农民的私营企业主, 也有可能获得成功; 但是, 有两类人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一是过去的非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 二是过去的农村干部, 但现在企业在城市的业主。而在模型 1 中, 前城镇干部和农民只是接近有统计显著性。与此对应的是, 过去的城镇无职业者, 最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第二, 在城市地区中, 如果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亲戚是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对于企业的成功显现出重要性; 亲戚是农村干部的, 也在城市地区对企业成功有一定的作用。而那些亲戚是无职业者的, 对企业成功完全没有作用。

第三, 地区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 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对企业成功都没有重要作用, 而交通运输状况则依然保持着重要性。

其他控制性的环境变量基本上都具有显著性。

从模型 1, 特别是模型 2 中, 可以得出有关私营企业成功的基本结论:

第一, 对于在城市中的私营企业来说, 那些曾经在非国有单位中担任管理人员和曾经是农

表 3

私营企业成功的分析模型 2

因变量: 被调查私营企业 1994 年底总产值或营业额(控制了通货膨胀)						
	农 村		城 市		备 注	
	b	t	b	t		
私营企业主本人:						
中共党员	0.33 **	2.8	0.01	0.0	参考变量	
专业技术人员						
前城镇国有单位干部	0.04	0.1	0.44 *	2.1		
前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0.10	0.2	0.26	0.7		
前其他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0.14	-0.4	0.70 **	2.8		
前农村干部	0.23	0.6	0.87 **	2.7		
前农民	0.03	0.0	0.61	2.2		
前普通职工	-0.04	-0.1	0.23	1.0		
前个体户专业户等	0.03	0.0	0.30	1.3		
原城镇无职业者	-0.15	-0.3	-0.27	-0.9		
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亲戚:						
专业技术人员					参考变量	
城镇国有单位干部	0.09	0.2	0.16	0.6		
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0.17	0.3	0.48	1.4		
其他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0.29	0.6	0.69 *	2.0		
农村干部	0.10	0.2	0.76 #	1.8		
农民	0.03	0.0	0.21	0.7		
普通职工	-0.06	-0.1	0.25	0.8		
个体户专业户等	0.23	0.5	0.20	0.7		
城镇无职业者	0.10	0.2	-0.7	-1.4		
年龄	-0.01 *	-0.2	-0.02 **	-3.5		
性别	0.30	1.4	0.34 **	2.7		
教育程度	0.19 **	4.8	0.13 **	4.9		
企业所在地:						
小城市					参考变量	
大城市			0.33 **	2.7		
中等城市			0.11	1.0		
村					参考变量	
镇	0.19 #	1.8				
人均国民收入	-0.14	-1.4	0.00	0.1		
交通里程/平方公里	3.40 **	4.9	1.27 **	2.9		
行业:						
社会服务业					参考变量	
农业	1.05 **	3.6	1.00 **	3.5		
制造业	1.21 **	5.4	0.90 **	5.7		
交通运输业	1.01 **	3.4	0.63 **	2.9		
建筑业	0.67	1.4	0.53 *	2.0		
金融业	0.71 **	2.7	0.65 **	4.1		
商业、服务业	0.46	1.1	0.82 **	3.7		
其他	0.97 **	3.5	0.93 **	3.9		
R2	0.26		0.33			
Cases	937		1191			
#P<0.01 *P<0.05 **P<0.01 ***P<0.001						

村干部的私营企业主,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其次是那些曾经是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和过去的农民,这一结果与前面的假设有了相当的不同:前城镇再分配者依然在私营企业成功中占有一定优势,无论是再分配经济的存在还是他们自身的经验、关系等,都将对他们经营私营企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上述模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企业的成功上最具显著性的原有身份,是过去非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和那些过去的农村干部。这样一种成功企业家的组合本身就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组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过去没有职业经验的城镇居民,他们最少可能获得成功。对于目前企业还设在农村地区的私营企业来说,党员身份对企业的成功具有明显的作用,但业主过去的其他身份差别对企业成功没有什么作用,即使是所谓的“无职业者”。

第二,作为业主个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越小者,越有可能获得成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里,私营企业主的教育水平对企业成功具有很强的重要性。

第三,作为社会网的一部分,私营企业主的亲戚关系在农村地区对于企业的成功都没有重要作用。在城市里,与业主过去身份的作用相似,只有那些是非国有单位管理干部的私营企业主的亲戚,才对业主本人的成功具有重要性。如果这种亲戚是农村干部的话,相对于其他人也会有一些促进作用;同样,这种亲戚如果是城镇无职业者的话,对企业成功完全没有帮助。

第四,大城市中的企业,比中小城市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在乡镇的企业比在村里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企业所在地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对企业成功没有显著性;当地的交通运输情况,则对企业成功具有很强的显著性。

三、讨 论

当一个社会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或过渡时,社会精英是再生产的还是循环的?这种转型或过渡对社会不平等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曾经引起激烈争论且还在继续。于此,上述关于私营企业成功的分析模型,则显示出较为复杂的情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 “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产”并存

就私营企业的成功来说,人们不能简单地说精英是再生产的还是循环的。

对于那些现在还在农村地区的私营企业主,过去的干部身份已丧失了重要性(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后面会有讨论),但是党员身份还保持着重要性。如果说党员是过去的精英的话,那么,在农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精英再生产”。长期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党在农村地区的控制,使得相当部分的农村精英被吸收到党内,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基础。在被调查的农村地区,过去具有农村干部身份的私营企业主41.2%是党员;过去是党员的私营企业主只约有20%的人过去同时也是农村干部。但是,一般党员的地位毕竟不同于干部,根本的区别在于,干部们具有直接调动和处置国有、集体资源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党员身份对企业成功的显著性,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再分配经济优势的显现。干部身份在农村地区不具有显著性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很多原来的农村干部,将他们的私营企业设在了城市中。

在城市地区,尽管前干部的身份对企业成功显示出重要性,但那些来自于非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和农村干部的业主,相对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党员身份并没有什么影响。城市地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持续1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党员身份已不再成为社会精英的标志了。或者说,一方面,有相对更多的城市精英没有被吸收到党员队伍中;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精英已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城市地区的结果再一次说明,在中国这样渐进向市场

经济转型的社会里,传统再分配经济的因素其作用也是不同的。农村中虽然党员身份具有重要性,但由于农村地区党员身份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党员身份的显著性完全归结于再分配经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在城市里,尽管过去的干部身份还保持一定影响,特别是那些曾经是农村干部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依然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企业的成功,然而那些在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中具有经验的主人,即过去的非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不仅仅有了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可能性,而且比起过去城镇地区的再分配者,更有可能在企业经营上获得成功。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进入非国有单位作管理人员之前的职业,但应该说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的经历对他们在私营经济领域中的成功更具有影响力。同样是身处较为市场化的环境中,个体户的身份对于企业成功就没有显著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精英的“再生产”,但已不同于再分配经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如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混合的一样,私营企业成功的机制也是混合的。而且不仅仅是混合的,前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的明显优势传递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即原来再分配经济的优势随着向市场的转型,虽然不会完全消失,但完全有可能逐渐减少。将这一结论与私营企业主亲戚的作用结合起来,可看到一脉相承的结果。

2 教育的重要性

与前干部身份作用的降低或消失形成对比的,是教育水平对企业成功具有的显著影响。在模型1和模型2中,在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中,教育都无例外地是非常显著的促进企业成功的因素。

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受教育和一定的学历在社会中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在几乎所有的人力资本中,接受正规教育的水平或学历程度可能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严格的行政化命令经济中,受教育水平并不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而行政权力地位则是更重要的因素,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使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借用伯迪尤(1997)的资本概念来说,与改革之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同的是,当整个制度结构都逐渐向市场转变时,政治资本虽然仍对决定社会地位具有较重要的意义,但至少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开始有了极大上升(Szelenyi, 1990)。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是以法律上具有平等权利的主体之间平等交换为基础,其地位获得(特别是经济地位)取决于对市场机会的把握,而教育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上,将有助于人们把握市场机会,在“开始面向市场转化的再分配经济”和“相对发展的市场经济”中,教育都将成为决定社会地位或收益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的私营经济领域中,教育所显示出的重要性,与其他市场化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社会的趋势相一致,因而作为考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指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在私营经济领域中,教育的作用基本上已经摆脱了行政权力的影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过渡时期或混合经济中,人们的学历程度或受教育水平还要受到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人们常常要在不同体制间进行成本或优势比较,这些制度性因素和优势比较,势必会影响到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所有社会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指标,因此我们一再指出,私营企业主的受教育水平相对于国有集体企业的负责人,还是比较低的,但这并不妨碍市场经济对人力资本给予较高报偿。

私营企业主的教育水平对企业成功的重要意义,应该得到更多地解释。在我们的数据中,教育显示出了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能完全用市场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高报偿来解释,教育

在中国的私营经济领域中显示出如此高的显著性,与整个社会相对较低的教育水平有密切联系,中国还有约 1/4 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口中,大多数只接受过初级教育。因此,那些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人,会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3. 社会网的意义

上述分析统计结果所呈现出的大部分的亲戚关系和所有的朋友关系,都对私营企业的成功不具有显著作用,这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调查和分析之前,我们对社会网的意义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作者本人(1996, 1997)过去对私营企业主所做的一些分析,都认为社会网在中国对私营企业主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作者过去对私营企业主的分析,其模型中的变量与这次分析有所不同,方法上也有区别。因此,对于上面有关社会网,特别是朋友关系没有显著影响的分析结果,应该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了解的是那些来往最密切的朋友的情况。但是,现在看起来,“最密切”的朋友可能并不十分适合于了解私营企业主社会网对企业成功的影响。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关于社会网的一些研究表明,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不一定帮助最大(Granovetter, 1973)。第二,社会网是有结构的,个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网,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对企业成功不具有重要影响,不一定等于其他朋友对他没有作用。第三,对于企业主,特别是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来说,这样的问题可能本身就是无法通过问卷了解的。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猜想,只是表明,应该对上述结果持慎重的态度,这里无法给出准确的分析。

当模型 1 和模型 2 中显示出,在中国的成功私营企业中,前干部不具有重要影响,而教育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时,这一结果是否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具有前干部身份的私营企业主相对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因而将他们的身份影响掩盖了呢?模型 3 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检验,即将教育水平变量从模型中剔除,并对企业成立的时间进行了控制,然后看前干部身份是否显示出影响来(见表 4)。

从模型 3 中可以看到,即使不控制私营企业主的教育水平,他们过去的干部身份仍然对企业成功不具有显著性,而且其他变量的影响基本上保持不变。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并非是教育变量的存在掩盖了前干部身份的作用(可与 Rona-Tas 的研究比较, 1994)。

将模型 3 略作改变,即控制住企业初始资金,其结果与模型 2 基本一样,但企业的初始资金具有很强的显著性,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企业的初始资金对企业成功具有显著性影响的话,那么是否因为前干部们在获得初始资金上比其他背景的业主更具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掩盖了前干部的直接优势?模型 4 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检验(见表 5)。

从模型 4 可看到,在获得初始资金方面,前干部身份同样不具有显著性,相对来说,还是那些曾在非国有单位任管理人员的身份和个体户身份,接近具有显著性。这种结果应属正常,因为他们相对他人来说更有可能在过去的职业中积累一定的资金,而在农村地区的党员,也在初始资金的获得上占有一定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的社会精英。

4. 需求与交易成本

在几乎所有的模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与需求和交易成本相关的因素,都对私营企业的成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目前所发生的社会转型的方向或性质。

表 4

私营企业成功的分析模型 3

因变量: 被调查私营企业 1994 年底总产值或营业额(控制了通货膨胀)						
	农 村		城 市		备 注	
	b	t	b	t		
私营企业主本人:						
中共党员	0.50 ^{**}	0.9	0.13	1.0	参考变量	
专业技术人员						
前城镇国有单位干部	0.35	0.9	0.44 [#]	1.9		
前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0.57	1.1	0.23	0.5		
前其他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0.16	-0.4	0.79 ^{**}	3.0		
前农村干部	0.31	0.8	0.67 [*]	2.0		
前农民	-0.02	-0.0	0.28	1.0		
前普通职工	0.10	0.3	0.02	0.0		
前个体户专业户等	0.18	0.5	0.23	0.9		
原城镇无职业者	0.10	0.2	-0.46	-1.4		
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亲戚:						
专业技术人员					参考变量	
城镇国有单位干部	0.09	0.2	-0.29	-1.0		
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0.06	0.1	0.16	0.4		
其他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0.51	0.9	0.73 [*]	2.0		
农村干部	0.07	0.1	0.24	0.5		
农民	0.02	0.0	-0.25	-0.8		
普通职工	-0.08	-0.1	-0.14	-0.4		
个体户专业户等	0.21	0.4	-0.41	-2.6		
城镇无职业者	0.26	0.4	-1.42 [*]	-2.6		
年龄	-0.00	-1.2	-0.02 ^{**}	-4.4		
性别	0.51 [*]	2.2	0.58 ^{**}	4.3		
企业所在地:						
小城市					参考变量	
大城市			0.46 ^{**}	3.6		
中等城市			0.26 [*]	2.1	参考变量	
村						
镇	0.20 [#]	1.9				
人均国民收入	-0.10	-1.0	0.17 [*]	2.0		
交通里程/平方公里	4.15 ^{**}	5.7	0.98 ^{**}	2.1		
行业:						
社会服务业					参考变量	
农业	1.39 ^{**}	4.6	1.53 ^{**}	5.0		
制造业	1.32 ^{**}	5.8	1.13 ^{**}	6.6		
交通运输业	1.08 [*]	2.1	0.54 [#]	1.9		
建筑业	1.25 ^{**}	4.0	0.91 ^{**}	4.0		
金融业	0.51 [#]	1.9	0.85 ^{**}	5.0		
商业、服务业	0.68	1.5	0.91 ^{**}	3.9		
其他	0.91 ^{**}	3.2	1.03 ^{**}	4.1		
企业业成立时间:						
1993 年	-0.19	-1.2	-0.52 ^{**}	-4.3		
1994 年	-0.86 ^{**}	-4.9	-0.93 ^{**}	-5.9		
R2	0.15		0.19			
Cases	1039		1336			

#P<0.01 *P<0.05 **P<0.01 ***P<0.001

表 5

私营企业成功的分析模型 4

因变量: 被调查私营企业初始资金规模						
	农 村		城 市		备 注	
	b	t	b	t		
私营企业主本人:						
中共党员	0.34 ^{**}	2.3	0.02	0.1	参考变量	
专业技术人员						
前城镇国有单位干部	0.41	0.9	0.23	0.9		
前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1.03 [#]	1.7	0.49	1.0		
前其他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0.07	-0.2	0.58 [#]	1.9		
前农村干部	0.19	0.4	0.25	0.6		
前农民	-0.03	-0.0	0.10	0.3		
前普通职工	0.19	0.4	0.27	1.0		
前个体户专业户等	0.45	1.0	0.54 [#]	1.9		
原城镇无职业者	0.58	1.1	0.47	1.2		
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亲戚:						
专业技术人员					参考变量	
城镇国有单位干部	0.12	0.2	-0.36	-1.0		
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0.07	0.1	0.03	0.0		
其他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	0.83	1.3	0.71 [#]	1.7		
农村干部	0.03	0.0	-0.51	-1.0		
农民	0.30	0.5	-0.19	-0.5		
普通职工	0.16	0.3	-0.26	-0.7		
个体户专业户等	-0.00	-0.0	-0.62	-1.6		
城镇无职业者	0.36	0.5	-1.46 [*]	-2.5		
年龄	0.02 ^{**}	2.8	-0.00	-0.0		
性别	0.26	1.0	0.50 ^{**}	3.2		
教育程度	0.06	1.2	0.08 [*]	2.5		
企业所在地:						
小城市					参考变量	
大城市			0.05	0.3		
中等城市			0.18	1.3		
村					参考变量	
镇	0.15	1.2				
人均国民收入	0.00	0.0	0.31 ^{**}	3.2		
交通里程/平方公里	0.80	0.9	0.42	0.8		
企业成立时间	0.10 ^{**}	7.0	0.10 ^{**}	7.5		
行业:						
社会服务业					参考变量	
农业	1.29 ^{**}	3.7	1.44 ^{**}	4.1		
制造业	0.78 ^{**}	3.0	0.79 ^{**}	4.1		
交通运输业	1.39 [*]	2.3	0.48	1.4		
建筑业	0.84 ^{**}	2.4	1.02 ^{**}	3.8		
金融业	0.11	0.4	0.71 ^{**}	3.7		
服务业	1.24 [*]	2.3	0.39	1.5		
其他	0.72 [*]	2.2	0.76 ^{**}	2.6		
R2	0.09		0.12			
Cases	994		1306			
*P<0.05 **P<0.01 ***P<0.001 #P<0.01						

在传统再分配经济下,需求是自上而下由中央计划者决定的,企业的发展体现了国家对资源的分配,市场价格或需求基本上被扭曲。但是,从模型 2 中可以看到,在城市所有的行业、在农村大部分行业,都对企业成功具有显著性。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从事农业(包括种植、养殖,包括粮食作物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私营企业,都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成功,这不仅与再分配经济有很大区别,而且也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在传统再分配经济下,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完全处于从属于城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地位;第二,社会对农产品等具有巨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传统再分配经济下受到人为的压制;第三,即使是中国改革后的农业,仍然以小规模分散的经营方式为主,很难满足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因此,一旦经济开始向市场化转变,特别是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市场化后,这种需求对企业产生强烈的刺激。那些更多身处市场之中的企业,就有可能更快地发展起来,本文前面所给出的基本分布数据也表明,经营农业的私营企业的产值或营业额,其平均数水平最高,达到 989.81 万元,按照中位数水平来衡量,也达到了 190 万元,位居第三位,这在再分配经济下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的私营经济领域中,对一般市场经济下企业经营具重要影响的交易成本因素,也开始对企业成功发生作用,尽管私营企业所在地区、交通运输状况等是最基本的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从模型 1 和模型 2 中首先可看到同样的结果:在城市地区,那些身处大城市中的私营企业,比起中小城市的私营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在农村地区,位于镇上的私营企业,将比在乡村中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城市地区的数据还显示出城市从大到小的优势递减,即城市越大,企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显著。同时,企业所在地区的交通运输状况也显示出较高的显著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一因素的影响超出了城市。对于这些变量的解释,在前面已多有涉及,应该说,这些变量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企业成功的一般变量,在我们有关私营企业成功的模型中,这些变量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化发展程度的指标。中国是一个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社会,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在传统再分配经济下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起来,而在一个相对市场化的环境中,城市中聚集起来的经济活动和较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助于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促进企业的发展。

四、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转型

模型 1 至模型 4 显示出来的结果,与我们在开始时所提出的一些假设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前干部身份的作用。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所作的一些其他企业成功的模型,结果与我们最初的假设也有较大的差距。我们的任务当然不应该仅仅将实际发生了的情况揭示出来,更重要的是需要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主身上,表现出模型 1—4 所反映出来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理解,必须放到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才有可能被认识。

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主要是在政治体制出现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不能说在激进式变革出现之前,这些国家中没有发生任何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但是撒列尼等最初研究的“自下而上的静悄悄的革命”(Szelenyi, 1988)或“侵蚀阶段”(Rona-Tas, 1994),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还仅是未有实质性改革的“改革”;无论是家庭农场、家庭经济还是第二职业等,都没有构成一种普遍的体制结构和经济整合机制,也没有成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它更多地属于“政策调整”的范畴,直至 80 年代末期,在东欧原社

会主义国家中, 国有经济总产值仍占国民经济总产值 95% 以上, 类似的变化在中国改革前也发生过, 区别在于中国的这种变化常为政治斗争所中断。

上述国家在旧体制日益僵化、经济日趋停顿的情况下, 最终导致“激进式”的变革, 从而开始了所谓“自上而下”大规模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实, 很多有关精英再生产的研究是针对这时的“市场转型”阶段的, 并认为, 在这种社会转型中, 前干部表现出较大的优势 (Rona-Tas, 1994)。但是, 我们应该注意到, 这种“精英再生产”现象发生的背景, 既不同于 70 年代初的匈牙利, 也不同于 80 年代的中国。这些国家在激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整合机制转型中, 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征:

第一, 政治制度和经济整合机制的激进变化, 并没有立刻或完全改变社会资源及其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布, 或者说, 资源分配机制的变化与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状况变化并非是完全一致的。相当一部分原来就掌握资源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人, 尽管其权力的制度基础已经改变, 但他们的权力地位或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 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 即: 由再分配权力或行政权力转化为对原国家财产 (大量社会资源) 实际上的拥有; 他们虽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政治制度垄断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占有, 但在新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仍然占有优势。

第二, 虽然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整合机制的激进变化, 不可能立刻改变社会资源的分布及社会分层的基本状况, 但由于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分层的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而那些过去在再分配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前干部, 无论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进入了市场化的环境中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他们过去赖以生存和向上流动的机制已基本不存在。他们大规模进入市场经济领域时, 由于我们在第一方面所说的优势, 也有可能表现出较大的优势。与他们相比较, 那些在“侵蚀阶段”进入私营经济领域的、原来的“弱势群体”, 将会丧失他们因为时间占先所曾经享有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既没有发生过那种静悄悄的改革侵蚀阶段, 也没有出现激进式的变革, 如果说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特点的话, 这种渐进式改革至少有如下基本涵义:

第一,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是以多元结构并存的方式进行的, 即: 在全社会范围内会形成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长期并存的格局, 人们曾用各种概念来描述这种特点的社会结构分化, 例如“体制内”、“体制外”的体制二元结构 (时宪民, 1993), “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 (Szelenyi, Victor Nee, 同上), “旧体制经济”和“新体制经济” (樊纲, 1992), 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等。两种或多种结构并存的情况, 即混合经济和混合体制的情况, 并没有像人们通常所预想的那样, 发生激烈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第二, 多种体制之所以能够并存, 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 这一转型是自上而下有控制地推动, 在推进过程中上下结合的结果。之所以强调中国的转型是自上而下的有控制过程, 主要相对东欧而言, 因为在东欧所发生的激烈的“向市场转型”, 从机制上看并不真正是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 而恰恰是自下而上“革命”的结果。其二, 正因为是自上而下有控制推动的结果, 因而, 在原有再分配体制外发育出一个“新”体制的同时, 原有再分配经济也在逐渐得到同一方向 (市场化) 的改造。

上述两个特点,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我们可以将上述两个特征所带来的实际转型过程称之为“非均衡的转型”, 或者称之为“同向不均匀的结构转型”, 意思是指社会的不同部分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型。之所以中国向

市场的转型成长期保持多种体制、多种机制,是因为不同体制和机制的差别只在于向市场转型的速度和程度,而不在于是否向市场转型。就好像赛跑一样,运动员以不同的速度跑完赛程。

第二,在这种混合体制的状况下,任何纯粹的体制或制度形态都是不存在的。也正因此,多种体制和制度的长期并存才有了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控制不同部分的转型速度和程度,将会对这种特定的转型产生很大影响。

第三,混合体制的存在,为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确定自己在这种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多元化的体制性或制度性选择,从而也提供了实现利益的社会渠道,因而体制性或制度性冲突也相对减少。

第四,在这样的转型社会中,混合体制或多元体制并非意味着社会结构体系的分裂,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尖锐对立,与对立和矛盾同时存在的,还有在它们之间发展起来的多种多样的交换关系和相互渗透关系。在混合经济、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类型、多种经济整合机制并存的基础上,人们从各自的结构性地位置出发去“竞争”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在制度性基础上社会地位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和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

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原有的经济体制会不断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会不断带动原有经济体制的变革,正因为如此,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至今为止才能够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只要这两种方向的力量仍然在起作用,渐进式变革将会长期进行下去。

基于这些认识,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对模型 1—4 的结果作出再解释。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旧体制在不断的市场化过程中并没有被彻底改变。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在传统体制基础上发生的,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起作用,而且在“渐进式”转型过程中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David Stark, 1992)。因此,现阶段,我国所谓“体制外”结构的发展并不足以取代体制内结构;原有的再分配经济以其所控资源和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地位。特别是以下两个因素的变化使得这种影响力得以保持:第一,与体制的萎缩相对照的是,直接掌握行政权力的个人的权力地位在不断加强;第二,传统再分配经济也在不断的市场化。传统的行政权力和经济结构可以并且在实际上常常涉身于市场经济或体制外结构中。因此,农村的党员身份、农村干部和城镇国有集体单位干部的身份,对于私营企业的成功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已经多次强调指出,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典型的混合结构或混合机制,表现出“非均衡的社会转型”或“同向不均匀的转型”,无论不同体制之间在形式上存在多大的差异,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型是共同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再分配经济和行政权力与过去相比,将不断萎缩,市场化的程度将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相对更加市场化的体制,在新的社会空间里长期存在并获得长足发展,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出现过的,这会为私营企业的成功提供可能的空间、资源和机会。实际上,中国大量的私营企业已经利用改革提供的机会,积累起巨大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当我们在一个相对更加市场化的结构中考察私营企业的成功时,私营经济部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经济部门,其资源分配规则、产权结构和运行规律都已与再分配经济有了很大差别。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那些社会因素,亦会在相当程度上取代行政权力的作用,在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和企业成功的众多因素中占有了重要份量。因此,那些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的身份、年龄、教育水平、经济环境等因素,对私营企业的成功具有更大的影响。

就现实而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存在简单的社会结构制约方式和机制,也不存在简单的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分层机制和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将最终取决于转型过程的特点,取决于特定转型过程的社会和政治条件(Ivan Szelenyi and Szonja Szelenyi, 1990)。

基于上述认识,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中,社会结构变革的机制以及机会结构的状况,同经济和体制上的混合状况一样,也将是混合的。私营企业的成功将是多种机制推动的结果,私营企业主是这种社会结构变革最具代表性的产物。对于一种新的,在社会结构中具有较高位置的社会地位群体(私营企业主)来说,人们获得这种地位的机会结构因此也是多重的。而在私营经济领域中,以及由它所引发的新的社会不平等,已不同于在传统再分配经济中存在的分配性不平等。多重体制、多重变革机制和多重机会结构的出现,将有利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有利于改变原有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并将产生新的调节这种社会不平等的机制。

参考文献:

- 李路路, 1998a, “结构性优势和结构性障碍”, 《中国研究》, 香港, 1998年春季号。
- 路风, 1989, “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李路路、王奋宇, 1992, 《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李路路, 1998b, 《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路路, 1995, “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孙立平, 1995, “从‘市场转型’到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 《中国书评》9月总第7期、第8期。
- 孙立平等, 1994,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樊纲, 1992, “渐进式改革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香港, 11月第一卷(总第1期)。
-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1996, “现阶段我国企业经营者的职业流动与职业化取向——1996年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 《管理世界》第3期。
- 伯迪尤, 1997,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课题组, 1988, 《中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 北京: 改革出版社。
- 朱英, 1992,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 赵人伟、基斯·格里芬主编, 1994,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樊纲, 1993, 《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分析》,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jère)著, 张富强、许世芬译, 1994,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旭麓, 1992,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厚义、刘义璞, 1995, 《中国的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晓亮主编, 1992, 《私营经济论——对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系统考察》,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贾铤、秦少相, 1993, 《社会新群体探秘——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 时宪民, 1993, 《体制的突破》,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私营经济研究课题组编, 1989, 《中国的私营经济》,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4)》, 1994, 香港经济导报社。
- 《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 1996,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中国统计年鉴(1995)》, 1995,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中国统计年鉴(1989)》, 1989,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编, 1996, 《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1995)》, 北京。
- 道格拉斯·C. 诺斯(Douglass C. North)著, 陈郁等译, 1991,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 Theodore W. Schultz, 1975, “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3:

827—46, YS 3575.

Victor Nee,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663—681.

Victor Nee,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view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267—282.

Ivan Szelenyi,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e, Madison.

Ivan Szelenyi and Szonja Szelenyi, 1990, "Circulation of Reproduction of Elites during the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Theory and Society*, 24: 615—638.

Mark Granovetter,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80.

Yanjie Bian and Soon Ang, 1996 "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forthcoming; accepted May 1996).

David Stark, 1992, "Path Dependence and Societies Strategies in Eastern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17—54.

Akos Rona-Tas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40—69.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张宛丽

第三次亚太社会学年会(1999年)即将召开

根据亚太社会学学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第三次亚太社会学年会将于1999年2月4日—6日在韩国国立济州大学召开(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年会的中心议题是:总结过去,面向未来:21世纪的亚太社会(Learning from the Past, Looking Toward the Future: Asian Pacific Societies in the 21th Century)。围绕着这个中心议题,还拟定了十三个讨论专题:1. 家庭的多样化;2. 性别之间的关系;3. 城市:城市成长中的问题;4. 现代性,认同感和民族;5.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6. 全球化,自由化和发展;7. 国际间的移民;8. 社会福利与健康;9. 亚洲社会学的理论思考;10. 媒介,文化与社会;11. 性文化与社会变迁;12. 亚洲阶级结构的变化;13. 变化中的组织与工作。

年会的报名费为65美元。年会秘书处及联系教授的地址及传真电话是: The 1999 APRCS Secretariat, c/- Professor Dai-yeun Je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 1 Ara-dong, Cheju City, 690—756, South Korea, Fax: 0082 64 252071.